

论聂华苓长篇小说中的文化意蕴

——从《桑青与桃红》到《千山外,水长流》

李亚萍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著名华文女作家聂华苓的两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水长流》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名篇巨作。这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寓意、身份认同的隐喻乃至小说结构特征三个方面都呈现出作者鲜明而独特的文化意蕴:不同时期对中国形象的表征;家国认同的转变及作者对海外华人身份及作用的重新认定。

【关键词】聂华苓;文化意蕴;海外华人;家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01-0015-06

聂华苓是海外华文作家中成绩卓著、影响较大的一位。1925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9 年迁往台湾,1964 年移居美国,她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在台湾期间,聂华苓就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人所知,成为台湾文坛的新秀。去美后,聂华苓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技巧或思想内涵上都更为成熟,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1]和《千山外,水长流》^[2]奠定了她在世界华文文坛的地位,并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作品广为流传。

《桑青与桃红》备受评论界关注,作品的内涵空间也在不断阐释中得到丰厚拓展。白先勇

曾高度评论这部作品,“《桑青与桃红》淋漓尽致地发挥放逐者生涯这个问题,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开阔,应该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3]85}。在他观点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多从“浪子悲歌”这一角度展开论述^①,偏重中国分裂与主人公精神崩溃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桃红替代桑青标志传统道德的彻底沦丧,充满悲观情绪。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身体政治等角度论述该小说,展现出较为不同的观点^②。美国华裔学者黄秀玲、中国台湾学者梁

【收稿日期】2013-08-25

【作者简介】李亚萍(1975—),女,江苏宜兴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海外华人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

① 白先勇认为聂华苓写出了流浪中国人的共同悲歌,之后,聂华苓本人也同意这是一篇“浪子的悲歌”(《桑青与桃红》序)。从 1979 年至今的很多评论文章中莫不以“流浪”、“漂泊”、“悲歌”等词来分析或评论该小说。如王晋民《论聂华苓的创作》(《文学评论》1981.6)、董之林的《漂泊者悸动的灵魂》(《小说评论》1995.1)、宋剑华《放逐者的心灵悲歌》(《海南师大学报》1994.1)直至晚近的李丽《一曲“浪子的悲歌”》(《华文文学》2004.4)等。

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黄秀玲教授在《桑青与桃红》1998 年英文版后记(Mulberry and Peach: Two Woman of China, 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1998)中就性别角度对桑青/桃红进行分析,给予积极肯定,并且认为作者引用精卫鸟的传说正是为了肯定桑青/桃红不可替代的文化女英雄的精神。台湾辅仁大学的蔡祝青援引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分析桑青/桃红精神分裂的内在因素。台湾师范大学的梁一萍则援引后现代女性空间理论认为《桑青与桃红》中桃红的游走是一种主动的挑衅,是一种积极的打破地图/国家统一性的、拒绝国族认同或国家意识的。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该小说,如援用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来分析其中的国族寓言(陈丽虹)、性别文化角度阐释(朱立立等)、身体政治角度切入分析(师彦灵等)。

一萍等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桑青/桃红是文化女英雄,主动挑战性别、政治及国族认同,颇具解构意味。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对上述论文中表现出来的乐观态度并不认可。笔者认为桑青/桃红主动挑战归属问题、放弃国族及文化认同(中国和美国)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选择,充满悲剧意味,而作者正是通过桑青/桃红这一典型形象凸显当时海外华人被迫逃亡、主动流离的群像^①。

对《千山外,水长流》的评论大多集中探讨主人公莲儿在双重文化中找到归属感,以此象征在美华人从流浪到寻根的转变,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族与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回归^②。笔者认为在该小说中作者要表现的不只是寻根与回归主题,更有意深入挖掘“美”、“华”之间的文化交汇主题;展现在美华人身份认同的新转变:既承认中国/娘家又认可美国/夫家;也为海外华人重塑历史责任即在海外搭建沟通桥梁,成为跨文化的亲善使者。

本文将基于对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细致阅读,从主人公的形象寓意、身份认同的隐喻及两篇小说艺术结构的特点等三个层面展开对比分析,挖掘作者在海外创作的这两部小说里植入的文化象征,展现作者对海外华人生存及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同时参照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2004)及《三生影像》(2008)^③,再现作者如何将其跨文化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

一、形象的寓意

《桑青与桃红》中最突出的是塑造了一个

性格分裂的中国女子:桑青/桃红。“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4]308}两种性格截然相反,形成鲜明比照,小说英文版直接用“两个中国女人”作为副题,突出其分裂的特征。小说开篇桃红就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性格开放、毫无畏惧、放荡不羁、充满挑战性。她放弃所有外在的标签,包括名字(可以随意命名)、个人历史以及国家认同,“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但我很快活。这个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么精灵鬼怪。那一套虚无的东西我全不相信。我只相信我可以闻到、摸到、听到、看到的東西。”^{[1]7}这个桃红已然受到美国嬉皮文化和女权解放运动的影响,放弃道德文化的约束,敢于挑战权威,率性而为。面对移民官的质询,她一再宣称自己无国无家没有历史的当下,以挑衅的姿态面对美国政府的跟踪与追查。作者对桃红充满期望,“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5]因而,黄秀玲等学者均认为桃红是小说中的文化女英雄,挑战性别、国族等边界,笔者认为桃红固然代表了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但其放弃一切的背后却是无尽的悲凉,她始终无法与桑青及过去真正诀别。

桑青软弱、胆小怕事、犹豫不决、被动,容易出现幻觉被神秘的事物所缠绕,这都指向桑青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更注重外在的标签

① 此处所谓“被动流亡、主动流离”有两层含义,正如聂华苓设置桑青/桃红两个形象一样,桑青是那一代中国人的代言,处于被迫流亡逃离的境况,而桃红则是作者试图为他们寻求解脱创造的主动型主人公,试图摆脱身上积聚的历史文化沉淀,轻松跨界。因而,“被动流亡、主动流离”一方面呈现政治历史现实对那一代中国人的压迫,迫使他们拔根离乡漂泊流离,另一方面则表达作者要放下历史包袱,轻松生活的理想。

② 如陈捷《聂华苓小说创作之社会文化心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7.6),朱邦蔚《从根的失落到根的回归》(《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2),李蓉《漫漫寻亲路 悠悠寻根情》(《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2.6),张国玲《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1)等都是从寻根角度对《千山外,水长流》进行分析阐释的。美国的王智明博士则在中美文化的交流来往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框架中分析该小说,认为小说过于明显的国族认同呈现出保守的主题取向(《“美”“华”之间,〈千山外,水长流〉中的文化跨越与际际想象》,《中外文学》,第34卷第4期,2005年9月)。

③ 这两部长篇中提及的事件有很多是带着作者个人色彩的。如桑青年轻时逃亡至重庆读书,在台湾期间被迫躲在小阁楼里,到美国后被移民官询问;莲儿的母亲凤莲在嘉陵江边小松林发生的恋爱故事等都带有作者个人的经历。

与认同,如父母、丈夫、情人及移民局等对她不同层面的认同,她的行为举止受制于外部世界,内在却充满矛盾。桑青体内的桃红早已存在,离家出走、初尝禁果乃至阁楼背叛事件等均展现出桑青的另一面。到美国后,桃红不断占据主体位置,处处压制并否认桑青的存在,并以“桑青千古”的方式与过去一刀两断。然而过去却如梦魇一般不断回闪,桃红时时被桑青困扰,移民局的追寻迫使在路上的桃红甩出桑青日记,重温过去确证自己与桑青的不同。两者的互耗、牵扯极具张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形象脱颖而出,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小说染上了焦躁不定的底色。

《桑青与桃红》中桑青从一个完整的个体逐渐走向分裂,两个性格、两个形象互相抵触,桑青/桃红与外部世界之间也同样处于紧张状态,个体的分裂源于外部世界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对抗。《千山外,水长流》中的莲儿则被塑造成一个从身心俱裂走向完善成熟的中国女性,在她身上更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积极适应和融入。出国前的莲儿类似桑青/桃红,总是处于逃与困的境地:遭遇“文革”,被指“杂种”,与父母决裂到农村寻找新的自我;又因出身不好,在农村爱情受挫,身体被玷污,只求早日离开中国,摆脱过去。来美国后,她发现自己的过去并未就此远去,反而愈加清晰,甚至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形象的维护者和代言人。于是莲儿开始“修复”自己,弥合身心创伤,而不是如桃红一样扼杀和压制过去。她一方面反思自己与母亲风莲的关系,在通信中了解母亲的情感和人生历程,理解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沉浮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关联,以此修复自己与母亲、祖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面对自己身体和情感创伤,通过与林大夫、表弟彼利之间的情感交流,走出心理阴影,逐步愈合内在伤痕,重新树立个体自信尤其是爱的能力。

莲儿亲和友善,纯朴善解人意,在交往中不卑不亢,善于学习等品质都使得她在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时表现得更为自如,以平和而非对抗的态度融入美国生活。到美初期,也有诸多文化上的不适应,特别是祖母的冷眼相待,莲儿并

没有放弃,以自己的善良行为感动了病床上的祖母。也因为她善于倾听和沟通,最终成为周围人的精神依靠,如居美十几年的林大夫、表弟彼利、爷爷奶奶以及流浪在美国的中国人老李等,都愿意成为她的知心朋友,并从她身上获得精神动力。莲儿的人格魅力不仅征服了彼利,更吸引了林大夫,他们愿意为她担忧,愿意为她付出。莲儿让他们看到了中国不同方面,彼利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温柔典雅的中国女子,林大夫看到的是一个善解人意、满腹心事、历经患难却又坚强的中国女孩。而莲儿形象的塑造,与当时中美建交的政治背景极为相关,中国该如何向西方世界展示自我,聂华苓在《千山外,水长流》中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中国形象应当是友善、坚韧、不卑不亢、善于学习的。

不难看出,作者塑造桑青/桃红、莲儿的形象都是寓意深刻的:他们是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具象表征。“这一部小说《桑青与桃红》是关于中国处境的一个寓言吧。不单写中国人,也写中国这个国家。”^{[4]315}桑青的分裂象征着二战后中国的分裂,家国分裂带来的则是个体内在的彷徨游离,一部分中国人四处漂泊无处栖身。虽然作者试图通过桃红来建构一个光明而了无牵挂的世界游民形象,但这个没有历史没有过去的疯癫女子真的那么洒脱吗?事实并非如此,她就像一座孤岛无所皈依,甚至不知该走向何方,她是一个无法摆脱历史摆脱身份摆脱国族认同的中国人,这是她最大的悲哀。而莲儿则代表了“文革”后的中国形象,历经磨难却沉稳内秀,她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善于学习、勇于沟通。从桑青/桃红的人格分裂走向莲儿的稳定成熟,也可看作聂华苓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画展现不同时期的中国面貌,同时也传达作家本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和重新认知。

二、身份的隐喻

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桑青/桃红对中美两国都采取背离姿态,表达一种“非此非彼”的态度:既不属于祖籍国,也不属于居住国。桑青以

逃离行为来暗示自己对中国的拒斥:新婚后与丈夫家纲逃离即将解放的北平前往台湾,从牢笼式的台湾逃往美国。然而对美国尚无情感,更不能简单认同,面对移民官“你是否忠于美国政府”的审问,桑青也无法做到口是心非。桑青/桃红对中国情感复杂,是故乡却难以回去,多年的战争、政治的分裂让她厌倦;在美国则处处受到限制,不断被移民官审问是否是共产党,是否忠诚于美国政府。她不仅对属于桑青的一切即过去采取决裂的态度,“桑青已经死了,桑青千古”;挑战权威“谁怕毛泽东?谁怕蒋介石?”;质疑真相“花非花,雾非雾,……”。她对美国的历史也采取抗拒和抵抗性的阅读,如对唐勒湖吃人事件的描述,这在美国历史里是西部大开发的移民悲壮史;对美国人极尽嘲讽与愚弄,如桃红对移民官的挑逗,对铁面人的嘲讽,对凯蒂和江一波生活状态的讥讽等。她要与一切美国常规作对,杀狗吃狗肉,在墓园与小邓做爱,跟着嬉皮士游荡,住在水塔里做一个世界人。桃红已然成为美国嬉皮士的一员,反对一切束缚,反抗一切制度,挑战权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她都采取逃离的姿态,以上路流浪作为唯一亦是最后的挑战。这种挑战带着悲壮和无奈的色彩,因而作者在小说的跋中引用精卫、刑天的故事来象征这种精神在桃红身上的延续。战乱频繁,国家分裂,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叛离心态,家国无法归去,新土亦不能扎根,这是那一代海外华人共同面临的处境,这种主动/被动拒绝根性的漂泊和流浪深蕴着浓厚的悲剧意味。

作者在莲儿身上却体现从“非此非彼”向“既此亦彼”的认同转变。“中美混血儿”这一种族身份确认了她与中美两国的血缘关联,但也因为这一混血身份,导致她在中国被指为“美帝特务的狗崽子”,下放农村后更遭到强暴,从而产生强烈的逃离心态。到了美国,奶奶并不接纳她反而处处怀疑她,她在石头城只是一个“外国人”,感到隔绝和冷淡。这种尴尬的身份令莲儿感到沮丧,但并没有使她退缩,反而促使她寻找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答案,重新认识父亲、母亲及中美两国的历史发展,以确立自我的位置。

到美国后,莲儿首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意识。当彼利与她谈论中国事务时,莲儿表现得相当谨慎;去参观父亲墓园时,莲儿由墓碑上的年份自然而然联想起中国的历史;当彼利问她究竟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时,莲儿“不假思索”“冲口而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她就成了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她原以为自己对中国的心冷了,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2]21}。这都说明莲儿内在对中国的强烈归属感,是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强烈情感联系。也正因为这种国家认同的确定性使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并要时时维护祖国的尊严。“不知为什么,到了国外,她不知不觉,对于她生于斯、长于斯、痛苦过、快乐过的地方反而有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感觉。”^{[2]122}

其次,在美国生活及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莲儿被压抑遭扭曲的人性得到复苏,重获新生。美国石头城朴实的风土人情、玛丽和彼尔老爹之间的相亲相爱、露西面对情感的坦承、彼利及其朋友们自由率性的生活方式等均影响了莲儿,她开始反思自己,学会表达,解开心结。“心结”之一是母女间的隔阂,“文革”中不问缘由与“反革命”的母亲断绝关系,在爷爷的启发下,她开始通过信件与眉批方式重新联接她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化解矛盾。“心结”之二是莲儿对性的恐惧,同样是“文革”中遭遇的身心创伤。在林大夫的帮助下,莲儿开始正视而不是逃避这一事实,通过心理疗法走向正常。学会爱和表达的莲儿逐渐成为小说的中心所在,作者赋予莲儿亲善大使之责,她不仅沟通母亲与美国祖辈的关系,更消除了自己与母亲两代中国人之间的隔阂,也成为在外流浪的海外华人间情感沟通的中介。“她突然发觉,她原是孤零零一个人,现在,竟有这么多人依赖她:母亲,爷爷,奶奶,林大夫,彼利。她也可以依赖他们了。”^{[2]414}莲儿也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混杂身份,“她现在见人就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老布郎的孙女’。”^{[2]445}这种“既此又彼”的认同不只是简单的国家认同,而是混杂了文化选择在内的认同。

从桑青/桃红放弃国家认同到莲儿作为混血儿在中美之间架构沟通桥梁的转变,象征了海外华人在移民历程中从失根流浪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这一转变无形中凸显出海外华人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意义,而聂华苓自身的经历也印证着这一转变。在爱荷华定居后,聂华苓及其丈夫安格尔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成为世界各国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无论是东欧、南非或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的作家都聚首此处,聂华苓就如同莲儿一样成为彼此沟通依赖的中心。或许我们可以说,聂华苓正是要通过莲儿这一形象为当代海外华人确立他们的历史使命:立足双重文化,架起沟通桥梁,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不再局限于中国执念,不再为文化认同而困惑焦虑,真正成为文化混血儿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间自由穿行。

三、“分裂”与“交汇”的艺术结构

作者在两部作品中试图通过两个女主人公再现不同时期海外华人的形象和命运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其中蕴藉的主题也极为明显:桑青/桃红大胆叛逆,拒绝认同中国或美国,以解构态度书写“逃与困”的流离人生;莲儿沉稳内敛,主动探寻中美之根,以建构方式展望中美和谐、世界大同的光明前景。为表达上述主题,作者对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有独到考量。

《桑青与桃红》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分裂”,聂华苓曾在《浪子悲歌》一文中提到“我在形式上也作了一个‘不安分’的尝试。小说写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物;小说的形式也是分裂的,桑青的故事和桃红的故事,双线并行。”^{[4]258-259}形式上的分裂首先体现在人物设置上的二元并置。桑青与桃红个性截然对立,相互抑制,作者对桑青与桃红的界定已经十分明晰这种个性的对抗,文中也一再出现“我好害怕另一个我,她专门做毁灭我的事”^{[1]310}，“桑青千古”桃红才能再生。其次在结构设置上也呈现分裂并置的特点。小说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别由桑青的日记和桃红的信件组合而成。桃红的信件展现的是美国现在的生活,桑青的日记则是中国过去的往事,桃红和桑青的

世界互相平行延伸,并无交集。虽然在第四部桑青与桃红同时出现在桑青日记中,作者用不同的字体表明两人的声音,但这两种声音并未达成对话效果,仍然是单声道独白的方式各说各话,而日记和书信的文体形式也很好地配合了这种对抗和分裂。作者选取一幕幕空间场景如船、四合院、阁楼等“试用戏剧的手法来讲故事”^{[4]257}的方式集中浓缩桑青/桃红人生历程,这四个部分彼此独立,并无情节和时间上的连续性。而在每一部桑青日记中,二元对峙的模式亦相当鲜明:第一部分桑青出逃被困三峡,船里船外的世界截然二分,战争与逃难、男与女、传统与现代的冲击;第二部分被困北平城,城里的城外、政权更替、新旧社会的对照;第三部分阁楼之困,阁楼内外的世界、自由与束缚、噤声与嘈杂的强烈对比;第四部分则容纳更多的对立因素,桑青与桃红、华人与华裔、中国与美国、生命与死亡等。

《桑青与桃红》形式上的层层分裂不仅加强了文本内在的张力,也更契合“逃与困”的主题。桑青/桃红看似游荡于两个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是分裂对抗、无法关联的,桑青就是“夹缝人”,被困于这么一种缺乏交流甚至是拒绝交流的境况中,无处逃脱。而这种困境也恰是聂华苓人生经历的艺术再现:中学时期逃避战乱;大学毕业恰逢内战;1949年迁台后遭遇婚姻、工作困境;1964年受邀前往美国留学,经历离婚,与安格尔相爱却无法在一起的困顿(直到1971年才结婚)^{[4]157-161}。

《千山外,水长流》则是一个双向交汇(interwoven)的结构,两代人、两个家族、两个国家、两种文化在互相勾连,互为交织,构成一幅宏阔的历史文化图景。小说以莲儿为中心人物,联系起父亲—美国与母亲—中国的关系,细密交织、融合中美历史与文化,交汇的模式尤为突出。小说中人物、地点、情节的设置都带有双向对等性,如长江与娥普西河、南京(中国的石头城)与爱荷华石头城、父亲与母亲、彼利和林大夫,作者在这些双向设置中建立起某种平衡。这些因素在莲儿追寻自我重新认识家国的过程中融汇成一体,并以莲儿为中心,展开各种对话与交流。与爷爷奶奶的交流了解石头城的历史

与文化,了解父亲过去的生活;与母亲的通信中以眉批的方式呈现自己与母亲的思想交流,重新认识母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历程;与彼利及其朋友对比美国六十年代嬉皮士和“文革”红卫兵的价值观念和理念;与林大夫及其他美国华人的聚会了解海外华人的中国执念等。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是基于平等共存的基础上,最终均能互相理解、达成共识。这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世界,正如小说中的“白云酒店”一样,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大家和平共处,相互依靠,共同走向世界大同。

作者不仅在小说结构安排上颇具心思,同样在小说氛围的营造上也紧扣小说主题。《桑青与桃红》尝试运用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后现代小说的技巧来呈现主人公分裂的内心世界:如书信与日记的交叉叙述以呈现主人公个性分裂的特征,以精卫鸟的故事象征主人公不屈斗争却徒劳无获的虚无,小说中图片、地图等文本的并置表现出较强的小说创新意识。小说的第三部尤为突出,为表现阁楼中人被监禁、被噤声的恐惧,作者用桑娃的漫画来反映主人公对自由的渴望;以一字一顿的默声交流对比风声鹤唳的外部世界;以桑娃的只懂爬行暗示被囚禁者的身体禁锢等。《桑青与桃红》是个大胆而创新的实验文本,总体勾勒了海外中国人焦躁不安、动荡分裂的精神实质,营造出压抑、紧张、晦暗不明的小说氛围。相对而言,《千山外,水长流》的写作非常务实“安分”,主要以写实抒情笔法将现实与历史交融。无论是战时重庆、南京风光或是爱荷华石头城的自然景色在作者笔下都呈现出一派优美和谐的氛围,尽管里面有沉重的历史,但基调是积极光明沉稳的,处处显示出作者落地生根后的自信笃定、安稳追求更高理想的心态。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见《桑青与桃红》及《千

山外,水长流》表现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文化心态,在身份归属、文化认同上的转变,这不仅是聂华苓个人命运的艺术表现,更暗示了一代海外华人对自身的重新定位:从“夹缝人”到“架桥者”的转变。转变源于作者本人在美逐渐扎根的现实和对国家认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在她的传记中,曾多次提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重新认识^{[4]3-5},并在了解中改变自己的看法,成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文化界人士。而对美国的认同也逐渐随着自己与安格尔的稳定生活、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增强;国际写作计划的实施更让她感受到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大同世界”的构想正是从此开始^{[6]365-515}。将两部长篇比较对读,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作家自身生活的转变对海外华人命运的叙述也会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转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主题词的涵义也发生在衍变,如“边缘人”、“认同”等这些关键词会随着发生涵义上的扩大和缩小。因而在进行具体个案研究时,切忌武断下结论,应以跨文化的视野理解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在逐步的跨越和历史发展中体味并耙梳海外华人特殊而复杂的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 [1]聂华苓. 桑青与桃红[M]. 香港: 友联出版社, 1976.
- [2]聂华苓. 千山外,水长流[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3]白先勇. 流浪的中国人[C]//第六只手指.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9.
- [4]梦花. 最美丽的颜色: 聂华苓自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 [5]廖玉慧. 逃与困: 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J]. 自由副刊, 2003-01-31(35).
- [6]聂华苓. 三生影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责任编辑 吴奕铸 责任校对 王 桃]

English Abstracts

The Cultural Allegories in Nie Hualing's Novels: From Sangqing yu Taohong To Qian shan wai , Shui chang liu

LI Ya-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Hualing Nie created two novels *Sangqing Yu Tao-hong* and *Qian Shan Wai , Shui Chang Liu* which are great works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ssay analyzes the transi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otagonist's image , protagonist's identity and novel construction. Hualing Nie's cultural allegory , unfixable identity and the orien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an be revealed clearly through those three perspectives.

Key words: Hualing Nie; cultural allegory;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ime-Shifting” in the Cloud Computing Era: Analysis on the Optus Case

XU Yan-bing

*Law School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the legislative adjustment , the legality of cloud computing has been passed the judicial review by the way of legal precedent. There have been legal precedents regarding the cloud computing in United States , Singapore and Germany. But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dgment of Optus case by the Full Court of Austrial in April 2012 and the

one of Cablevision case by the Second Circuit Court of United States in 2008. Due to the analysis on the judgment of Optus case ,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time-shifting” rule of copyright law under the cloud computing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to handle the cases regarding the “cloud computing”.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 Copyright; Time-Shifting

Chinese Model of Impeachment Ru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e witness

MOU Lu-ye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 China*

Abstract: As a sort of supplementary evidences , impeachment evidence is designed to argue the reliability of witness and credibility of his/her testimony. Chinese Criminal Evidence Law absorbs four reasons for impeachment in Anglo-American Evidence Law , including (1) bias or interest , (2) sensory or mental defects , (3) specific contradiction , and (4)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Additionally , due to the preference to fact-finding and affiliated competence of evidence , it is advisable and reasonable to impeach the competence of evidence as well as the weight of evidence. Compared with cross-examination , Chinese lawyers do better in impeachment by submitting extrinsic evidence. The cour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redibility and truthfulness of evidence and the “new legalism on evaluating evidence” has brought great effects in profound ways. Chinese impeachment